1. 引言

中国公众对中国政治体制民主程度和民主满意度一直是比较政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未解之谜。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将通过促进社会和文化变革，实现民主转型。然而，即使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时期，同时伴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和受教育人数的大幅增涨，但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并没有受到挑战。学者们对这一现象提出了各种解释，(孟天广和杨明 2012)从绩效合法性角度解释中国政府通过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和提高福利水平来“购买”忠诚度；也有学者从政治灌输和信息控制的视角出发，强调中国政府对教育体系和认知资源的控制阻碍了现代化带来的文化变迁，导致知识分子和认知精英在政治自由主义倾向的倒退(Liu, Su和Wu 2023)。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便是政治文化主义的解释，有人认为中国儒家文化的父权制和威权主义遗产阻碍了民主的出现(Wang 2007)。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论调便强调西方自由民主观念并不适合亚洲。(Lu和Shi 2015)发现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之所以享有极高的民主评价，主要是由于中国公众所特有的民主观念。

毫无疑问，文化主义视角为“中国例外论”提供了可靠的解释，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大众的民主观念仅仅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可以悲观的预测根生蒂固的儒家文化传统导致中国就此与民主转型再无瓜葛。此外，如果这一分析正确的话，那么又如何解释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导致的1989事件呢？中国例外论是真的吗？我们认为，此前关于中国公众民主观念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横截面的数据或者仅通过观察中国的总体文化趋势来进行的。但这实际上忽略了民主观念的代际差异。政治社会化理论认为，不同世代所处的经济发展状况会对个体的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滞后和缓慢的(Richard G. Niemi和Hepburn 1995; Sack 2016)，因此需要研究者考察多期调查才能反映出民主观念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的差异(Inglehart 1990)。另外，考虑到年龄-时期-世代的完全共线关系(Inglehart 1997)，之前的研究并没有识别和分离出世代差异的“纯效应”(Grasso 2014)。为了得出由于别生命周期效应和时期效应的世代效应，我们采用WVS多期调查数据，结合横断面和纵向分析来探讨民主观念的世代差异，这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中是一种罕见的做法。

本文还探究了经济发展对中国公众民主观念变化的具体机制。现代化理论的文化主义视角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并非简单的单向联系，经济发展首先带来了对权威认可的下降、对少数群体包容的增加、对私营经济渴求的提高以及对自我尊严的强调等一系列自我表达价值观，而这一文化变迁最终带来了可欲的民主观念(Ciftci 2010; Inglehart 1997)。因此，我们识别出经济发展对民主观念的四条中介机制：性别平等、社会容忍度、自由竞争和淡化权威。

通过APC模型(Yang和Land 2013)和中介效应模型(Imai等 2014)，本文发现：首先，中国公众的民主观念确实存在世代差异，中国公众的程序性民主观念日益增加，尽管功利性民主观念呈现下降趋势，但世代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其次，经济发展确实促进了民主观念的代际更替，主要是通过促进性别平等、提高社会容忍度和刺激自由竞争观念三种机制，而对权威的淡化并没有显著影响。在中国公众民主观念的研究中引入世代维度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针对中国公众所做的民主观念调查时期都相对较短，通过世代的划分可以利用同样的数据获得民主观念在更长时间范围内的变化趋势，使得本文可以在更大时间尺度上关注宏观因素的历史作用。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 2 节回顾了有关现代化理论和民主观念的相关文献。第 3 节解释了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得出的假设。第 4 节描述了我们的分析策略和变量。第 5 节介绍了实证研究结果。第 6 节简要讨论了这些发现。

1. 文献综述和理论
   1. 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必然带来民主化和民主政治的稳定与持续，这一命题也得到了大多数民主化研究学者的证实和支持(Jensen和Skaaning 2012; Przeworski和Limongi 1997)。正如(Lipset 1959)最初指出的那样，民主的社会条件一直是政治学的核心问题，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民主转型，且各国通往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条，这条道路始于社会经济现代化，终于政治现代化。然而，许多学者却指出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Inglehart和Welzel 2010)，观念和价值观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Inglehart和Welzel 2005)。价值观的变化是将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联系起来的主要解释机制。如果经济发展引发民主转型，它首先要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因此，如果不研究价值观的中介作用，就很难严格检验现代化理论。在此基础上，英格尔哈特从文化主义视角对现代化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正，他指出民主政治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结果，但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价值观变化，会导致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Inglehart 1990; Inglehart和Norris 2017)。因此经济发展、文化嬗变和政治转型有着内在联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可预测的。具体而言，(Inglehart 1997)从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出发，提出经济发展会带来收入的增加、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教育的普及等现代化，进而给人类社会带来普遍的代际“文化转移”。首先，匮乏假设指出，个人的价值观和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其未成年时期确立的，而这种价值观的确立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而且人们一旦在青年和童年时期确立某种价值观，他们成年后也会继续保持这种特征(R. G. Niemi和Sobieszek 1977)。其次，社会化假设表明，在单个社会内部，大众政治心理和文化价值的变化是通过代际替换实现的(Van Deth, Abendschön和Vollmar 2011)：与老一代相比，新一代在成长过程中所处的经济物质环境存在差异，由此形成了与老一代不同的价值观念。而由于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在成年以后趋于稳定，这就导致了一个社会总体上价值观念变化的代际替代效应——随着老一代的离去，社会逐渐由新一代填补，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就发生了总体上的变化。英格尔哈特认为这两种假设结合起来就能够推导出一系列对价值观变革的稳定预测，前者可以推导出短期变化或阶段效应，后者则可以推导出长期的群体效应。

尽管上述现代化理论的文化主义视角在学术界引起了分歧，双方都有怀疑论者和捍卫者(Gerring等 2005; Inglehart和Welzel 2010; Jin和Zhou 2021)，但它仍然是解释大众价值观代际变迁的有力工具。如(Ciftci 2010)就发现阿拉伯年轻一代对性别平等和宗教多样性更加开放包容、对公民自由和选举竞争更加渴望。也有学者发现，中国年轻一代受教育程度更高，经济保障也更强，因而对中国威权体制的评价并不友好（Wang，2005，2010；Tang 和 Darr，2012；Tang，2016；Pan 和 Xu，2017）

但也有学者指出，现代化进程不一定会创造出民主导向的公民（Bellin，2002；Kamrava，2005），威权国家通过向年轻一代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和更高的福利待遇，促进了大众对威权领导人的认可和政府信任的加强。如(Jin和Zhou 2021)就发现，中国最年轻的一代，即“习一代”，他们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较前代更加倒退，威权主义观念更明显。陈和杨通过对中国精英大学学生的实验调查发现，互联网在改变年轻一代价值观方面的有效性远大于经济发展，进而导致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倾向更深。上述关于现代化理论对价值观影响相互矛盾的结论可能是因为大部分研究对于主观态度的变迁分析只是测量了年龄、时期、世代效应中的一种，并未同时将三者纳入考量。然而，经济发展等宏观因素在时期和世代上的作用机制是有差异的，出生队列效应不同于年龄效应和时期效应这一事实并不直观(Su, Lien和Yao 2022)，而且往往被忽视(Lee 2024)。如英格尔哈特通过对美国民粹主义盛行的研究就发现，出生队列效应的存在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即经济因素不能解释为什么特定的人会投票给民粹主义政党——但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民粹主义投票现在比过去强大得多。

当前，已经有学者考虑年龄、时期和世代三者对中国公众价值观的影响，如XX，但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宗教观念等主观感知或者态度等社会人口层面，关于民主观念变迁的趋势，知之甚少。有部分学者研究了不同世代民主观念的差异，如吕杰发现中国60年代出生的世代比80年代出生的世代持有更多的监护型民主观念，但该研究只是借用横截面数据，无法区分世代和年龄效应。因此，这要求研究中在对中国公众民主观念的代际差异的长期趋势进行观察时，需要同时考虑年龄/生命周期效应、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

2.2民主观念

围绕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来组织民主的含义由来已久。从熊彼特到普沃斯基等人，民主通常等同于自由公正的选举。在熊彼特的著名论述中，竞争性选举是民主的黄金标准，而与社会经济相关的问题，如社会正义、社会平等或腐败，则是民主政治进程的结果，并不是民主本身的特征(Sartori 1987; Schumpeter 1994)。随后，(Dahl 1972)在其著作《多头政体》中确定了定义民主的八个标准，实际上是将民主等同于民主政府的机构和程序，这种制度/程序上的选举民主定义通常被接受为民主制度的最低标准。虽然学术界侧重于从政治角度解读民主，但民主的公众形象却具有社会层面的含义，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更是如此。针对这两种选择——程序/竞争与社会福利——构成了公众对定义民主的主要维度。许多研究表明，不同国家的人们赋予民主这个词不同的含义(Bratton和Mattes 2001; Mattes和Bratton 2007)，大众对民主的理解是复杂而多方面的(Dalton, Shin和Jou 2007; Lu和Shi 2015; Ottemoeller 1998)，包括对选举程序的最低限度关注到对社会经济平等的广泛要求。许多学者表明，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公众对民主的支持只是意味着对更高生活水平的支持(Karl 1990)。(Marshall 1950)早就一针见血的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居民都专注于经济需求，例如社会服务和普遍福利，而对民主的政治含义缺乏真正的理解。Zagrebina (2020) 发现，民主国家的人们倾向于以更“隐形”的方式来解读民主，而非民主国家的人们则通过更“可见”的视角来看待民主。

作为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流行的民主观念对民主的出现和巩固的前景具有重大影响。程序性民主观念强调制度公正性为民主的基本特征，是基于对民主所体现的政治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欣赏，民主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即使在经济衰退或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它也有潜力维持脆弱的政治政权(XXX)。与此相反，功利性民主观念强调治理结果为民主的基本组成部分，公民对民主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如果政权能够促进提高福利水平、缩小贫富差距，那么公众很可能会屈服于民粹主义领导人的诱惑，以政治自由换取经济发展。例如，(Ake 2001)通过追溯非洲国家建构失败的原因，表明非洲民主运动追求的是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权利，而不是抽象的政治权利；非洲人民坚持将经济机会、社会改善和社会福利制度作为民主的核心观念。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并不一定只是单纯持有程序性或功利性的民主观念。许多研究表明，人们大多以混合方式解读民主。这两种民主观念在实践中并不相互排斥，许多民主程序强大的国家也提供了丰富的效用。实际上，大众的民主观念实际上包含两种不同的产品组合：功利性产品组合（包括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就业机会、缩小贫富差距）和政治产品组合（包含自由公正的选举、言论自由、制度化的政治权利保护）。如(Spierings 2020)对11 个中东和北非国家（2001-2014 年）的 45 项民意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大多数民众将民主定义为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公民自由、提供公共服务以及维护法律和秩序。(Canache, Mondak和Seligson 2001)发现，威权国家的民众在判断民主时，通常无法正确区分一篮子经济商品和一篮子政治商品，并且认为经济商品似乎比政治商品更重要。因此，当我们谈论以民主观念衡量的“文化差异”时，我们指的是持有不同比例的混合观点。尽管民主的不同概念得到广泛认可，但在分析现代化带来民主观念变化的作用机制方面却出奇地有限。(Spierings 2014)对7个阿拉伯国家的分析表明，伊斯兰教影响来经济发展带来的性别平等，进而阻碍了民主观念的产生。然而这些分析是探索性的，几乎没有提供关于因果方向的信息。本文以中国为案例，探索经济发展对民主观念的具体作用路径。

3.假设

现代化理论的文化主义强调国家的宏观发展（例如GDP）和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对于解释群体民主取向的更替至关重要：具有传统价值观的老一代群体逝去，被年轻的群体所取代。由于年轻一代的群体在成长过程中拥有更多的物质保障和更好的经济发展情况，因此世俗和自我表达价值观将会在年轻群体中更加普遍。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由物质匮乏和黄油面包驱动的“腹中政治”会逐渐让位于强调程序和自由的“体面政治”。因此，持有和欣赏民主价值观的公民是现代化过程的副产品。我们可以预测，如果一个社会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繁荣，我们就会在该社会里发现新老群体在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年轻人可能比老年人更加强调自我表达价值观。这些代际价值观的差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会保持持续稳定状态，虽然暂时的或直接的经济波动会造成短期起伏，但新生代与较老群体之间的基本差异的趋势并不会改变，即使年轻人的年龄在不断增长，他们也不会接受老一代的价值观。

对于中国来说，(Harmel和Yeh 2015)的研究就表明出生于经济繁荣时期（1977年以后）的人比出生于经济匮乏时期的人对政治权利的要求更强烈。改革前出生的人群中只有15%的人认为“确保人们在工作和社区中拥有更多发言权”应该是国家优先事项，而改革后出生的人群中则有31%的人认为言论自由具有优先地位。也有研究通过对2000年和2007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分析，指出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青年后物质主义者比例最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物质条件的不断丰富，他们会给予那些非物质需求(即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更高的“优先权”(王正绪、游宇，2012)。鉴于自主性、自我表达、批判性等意识被视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主要表现经济发展带来的性别平等、容忍多元化以及个体自主性显然有利于“批判公民”的出现(Norris 2011)，从而推动自由竞争民主观念的形成。价值变迁理论也指出，人类的需求是按层次结构的，生存需求位于最底层，非物质需求位于最顶层。当一个社会长期享受富裕时，公众会认为经济和人身安全是理所当然而不再重视这些，转而强调政治权利和民主政府，要求自由、平等和选举。例如，在西欧和北美，二战后持续的经济繁荣使公众更加重视政治权利和负责任和透明的政府，也开始挑战国家权威和统治精英。据此，我们提出：

H1b：经济增长导致新老群体的民主价值观具有显著的世代差异

H1a：与年长一代相比，年轻一代所持有程序性民主观越来越强

根据前面的文献综述，我们发现经济增长并不是直接带来民主价值观的转变，而是通过一系列范围广泛且有内在联系的转变症候群。在转变中，经济发展与那些有助于民主政治的文化转型联系在一起，如对宽容、多元化、淡化权威、性别平等。简而言之，经济发展会导致民众世界观和信念体系的转变，继而回馈到民主价值观。例如，(Putnam 1994)就认为信任、宽容、团结的公民社区与民主制度的效率紧密相关。具体而言，我们将从性别平等、社会宽容、私有化和尊重权威四个方面研究经济发展对民主观念的作用机制。

作为民主宽容的“试金石”(Norris和Inglehart 2012)，性别平等蕴含着民主的基本价值观，性别等级制度则滋生了独裁文化(Fish 2002)。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性别角色限制被打破，女性不仅进入劳动力队伍，在管理中担任更高的经济角色，还开始在政府机关中获得政治影响力。女性在教育、就业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上越来越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作为人类平等的核心内容，性别平等价值的扩大和深入有助于推动政治平等、人权实现等方面。(Ross 2008)发现，性别不平等是中东民主程度低的原因之一，伊斯兰教对性别平等的排斥导致民主在他们的社会中无法持续。(Moaddel 2006)的研究表明，在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对妇女权利的支持程度更高，支持性别平等的人更有可能支持民主，而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情况则相反。作为世界上最不民主的国家之一，尽管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大量宣传男女性别平等（毛泽东曾宣称“妇女能顶半边天”），但大多数统治精英和公众都认为男性比女性更适合当政治领袖。然而，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中国将导致性别角色发生系统性和可预测的变化。据此，我们认为：

H2a：经济发展促进了性别平等，进而带来了民主观念的变化

社会宽容度对于政治多元化的稳定和持续运作必不可少，民主的发展与公民对不少数群体的包容息息相关，对其他群体的宽容促进了多数人统治和少数人权利的民主原则。对受欢迎群体的宽容从来都不是问题，因此如果想衡量一个国家真正的宽容程度，就应该寻找出人们对最不受欢迎群体的接纳程度。考虑到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对种族、宗教或者不同阶级表现出公开的敌意，排斥同性恋者却仍然是普遍现象，因此公众对同性恋的看法便成为多元民主关的另一项试金石。在专制和威权国家中，反对同性恋的程度根深蒂固：埃及和孟加拉国均为9%，伊朗为94%，中国为92%，印度为71%。相比之下，在稳定的民主国家，这些数字要低得多：美国为32%，加拿大为26%，英国为25%，德国为19%(Moaddel 2006)。当今，在较高经济和生存安全条件的保障下，中国公众对不同性取向更为宽容，对性行为的选择更加宽松，对同性恋的认可和女权运动的支持都快速扩大，而这种宽容和包容的文化氛围正是民主政治的必要部分。因此，我们认为：

H2b: 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宽容度的提高，从而带来了民主观念的变化

一些学者指出，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是自由民主的必要先决条件之一(Hayek 2007; Huntington 1993)，商业和工业的私有制以及较少的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从而为民主形式的政府开辟了更多的自由空间。经济发展带来对私有化和分权性的重视。一方面，与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庞大的管理部门的扩张相反，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将个人表现置于经济效率之前，对集体化官僚权威和大规模国有企业的认可度下降。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人们对个体自主性的日益强调，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由职业和个体经济。这两个转变趋势都牵涉对科层制权威模式的抛弃和对自由平等观念的日益强调。(Moaddel 2006)对沙特阿拉伯公民态度的调查表明，支持商业和工业私有化而不是政府所有制的公民对民主化持更积极的态度。基于此，我们期望：

H3a：经济发展刺激了私有化观念的产生，从而带动了民主观念的变化

淡化权威

4方法

4.1数据

本研究的实证检验来自两个长时期的数据源。第一个是WVS数据集，该数据集时期跨度较长，从1981年到2021年，共进行了7轮调查，该调查询问了受访者对权威、性行为、少数群体、家庭、工作、宗教、幸福和宽容等社会问题的态度。民主态度包括民主支持度、民主的重要性、所在国民主程度等一系列问题。本研究选取了第五轮(2013年)和第六轮(2018年)、第七轮（2021年）调查数据中的中国数据，这不仅能够让我们进行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还可以观察到中国公众民主观念的最新趋势。对于因变量，我们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中的一组调查问题的答案来衡量民主的概念。在2005年至2022年期间涵盖WVS5-7中，受访者被要求考虑一系列陈述，以评估它们是否是民主的基本特征（0-10的等级）。这些陈述是特意设计的，以区分对民主的程序性理解和功利性理解。我们认为，与其将民主的两个概念作为两个独立的独立变量，不如将两者结合起来更为重要。如前所述，大多数人都不会只选择民主篮子中的经济商品或政治商品，他们赋予每个概念的相对权重才是真正区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因素。为了衡量两者，我们选择了以下四个问题，并对“”和“”进行反向处理，最后对这四个问题进行加总求平均，得分越高，表示持有的程序性民主观念越强。经济数据主要来自我们的麦迪逊中国历史估算GDP数据，涵盖时期从1929年到2010年。以1990年不变的PPP美元衡量的GDP，图2显示人均实际GDP总体呈上升趋势。我们将经济数据和民主观念数据进行合并。为了区分不同世代所处的经济发展状况对价值观变化的影响，本文按照世代对人均GDP进行均值计算，进而得出不同世代的经济发展的差异。如前所述，本文重点关注民主观念的世代差异以及经济发展对世代差异产生影响的4种作用机制。为了检验现代化理论的文化含义，我们创建了“社会容忍度”、“性别平等”、“竞争经济”、和“尊重权威”四个变量。为了衡量社会容忍度，我们通过询问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在性别平等观念方面，我们通过询问人们对四个方面的看法（“大学教育对男孩更重要”、“男性能成为更好的政治领袖”、“男人比女人能成为更好的经理人”以及“女性做家庭主妇和出去工作同样可以成就自己”），我们上述回答进行加总，得分越高代表持有的性别平等观念越积极。同样，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测量，我们通过询问人们对“私营经济成分应该扩大”还是“国有企业经济成分应该扩大”的看法。我们预计随着经济的发展会降低对国家资源的依赖，更强调个人自主性。最后，为了衡量权威遵从度，我们通过询问人们对“注重传统，遵从家庭/宗教传承下来的习俗”的看法。为了进行比较，我们对上述四个指标进行了标准化。为了调整个体差异，模型还纳入了一系列人口和社会经济指标（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社会信任、主观社会阶层）。

4.2 世代的划分

政治学研究中，分析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的相对重要性对于了解社会变革的起源和轨迹通常至关重要(Egri和Ralston 2004)。现有对于世代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根据人口学标准，按照3年(李婷 2018)、5年(李婷和范文婷 2016)或者10年(Yang和Land 2008)为一代，进行划分。然而，正如曼海姆所言，纯粹的时间上的同时代性并不能产生相同的世代位置，就像没有人会认为1800年左右的中国和德国的年轻人属于同一世代。要共享一个相同的世代位置，人们必须生长于同一历史的和文化的地区，有对历史和社会的共同命运的参与，才能构成一个现实世代。“同一年龄个体是在参与了他们那独特的社会和时代潮流时、主动或被动地体验到构成其新环境的力量之间的互动时，才联合成一个世代。”如(Sack 2016)通过对东西德不同世代持有民主观念的实验分析发现，对于较年长的群体而言，在民主德国长大的人比在西德长大的人更支持社会主义价值观，而对于1985年或之后出生的最年轻的一批人来说，由于他们在统一的德国接受了社会化教育，因此他们对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观的支持程度并无差异。可见，由于不同出生队列所处的社会发展条件不同，导致公民在日后形成了不同的民主价值观。因此，第二类划分标准则强调要尽可能利用现实事件所造成的世代区隔，从而以历史、社会、文化的视角根据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来进行划分。(Van Deth和Elff 2004) 认为快速的社会经济变革对个人在政治意义上通常具有独特的身份意义，因此他将美国人分为战前一代、大萧条一代、沉默一代、抗议一代、失一代和务实的一代。

就中国而言，有研究表明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出生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民众产生以生存为主的意识，并对物质有较大的依赖性，出生于改革开放后期的民众由于社会经济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对物质依赖程度则有所下降和缓解。而那些成长于市场化改革时期的“80后”“90后”及“00后”的世代群体更是生活在物质条件较为丰富的时代，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艺术审美以及价值取向都不同于前几代人，能够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追求应有的社会公平正义，这些都较为明显的表现出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追求与倾向性。因此，他们将中国划分为“建国前”、“三年自然灾害”、“改革开放后”(吴晓刚和李晓光 2021; 徐延辉和赖东鹏 2024)；也有学者以重大的经济事件为界，将中国划分为“改革前（1978年以前）”、“改革期（1978年-1989年）”、“改革中（1989年以后）”(Lu和Shi 2015)；也有人根据社会重大事件将中国世代划分为“抗日战争（1931-1945）”、“解放战争（1945-1949）”、“三年饥荒（1959-1961）”、“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等(Wang 2007)。表1列出了有关中国世代的主流分类方法。为了尽可能贴近经济发展对民主观念的变化的影响，本文借鉴(Su, Lien和Yao 2022)等人的划分方式，将中国人划分为“战争的一代（1912-1945）”、“失落的一代（1945-1960）”、“幸运的一代（1961-1970）”、“转型的一代（1971-1980）”、“单孩的一代（1981-2001）”。

现有关于出生队列的民主观念研究主要使用重复横截面的数据进行估计，并没有将年龄、时期和队列这三种效应都纳入模型中，从而并不清楚出生年份分组的效应是否真正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化效应，而不是特定调查年份的生物衰老和/或不同背景影响的效应。为了分离出年龄和时间段的混杂效应、破除三者之间的相互干扰因素、得出“纯”队列效应，本文采用了Age-Period-Cohort模型。

图1中清晰地表明，如果采用传统方法比较民主观念的世代差异，即比较不同时代间民主观念的均值，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程序性民主观念还是功利性民主观念，两者都是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我们无法排除这究竟是年龄带来的生命周期效应还是世代效应，如果新老群体在民主观念上的差异反映的只是一种内在趋势，即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得日益不那么物质，因而带来绩效性民主的下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增长，年轻群体的民主观念最终会变得与年老群体一摸一样，而不构成国家的整体性转变。然而，通过采用APC方法隔离出年龄和时期的混杂效应后，我们发现，虽然功利性民主观念的确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不同世代并没有显著差别。与此相反，程序性民主观念却呈现出显著上升趋势，这意味着从长期来看，中国公众的程序性民主观念是在增加的。





Table 1 Cohort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socio- historic period of formative years compared to others in the literatur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e categorization employed in “Generation Cohorts and Personal Values: A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Qing Dynasty | Republican Era | Civil War | Consolidation Era |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 Social Reform | One Child |
| Era/Period | Before 1911 | 1945-1945 | 1945–1949 | 1950 - 1965 | 1966-1976 | 1977- |  |
|  | Pre-Consolidation | | | |  |  |  |
| The categorization employed in “China’s Age Cohorts: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 1949 | | | | 1951–1964 | 1965–1973 | 1975–1984 |
| Lv jie | Before 1978 | | | | | 1971–1976 | 1981–1986 |
|  |  |  |  |  | 1947–1962 | 1963–1978 | 1979–1983 |

4.3 中介效应

最后，由于本研究的目标不仅是估计经济发展对代际民主观念差异的影响，更是要探明产生影响的具体过程，因此本文采用中介分析来评估潜在机制(Imaietal.，2014)。首先，我们检验了经济发展对民主观念变化的影响，即经济发展的提高会带来程序性民主观念的增强；其次，我们检验性别平等、社会容忍度、市场竞争和淡化权威的中介效应，即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上述4种中介作用于民主观念。此外，为了充分捕捉经济发展可以同时影响上述所有中介变量这一事实，我们在估计每条路径时，都在同一模型中控制了其他路径的影响。当然，许多其他因素（如教育、性别、社会阶层等）也可能对民主观念产生影响。为了排除这些干扰因素，我们在中介分析过程中加入了与第一步相同的控制变量。因此，通过对于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塑造公民所持有的民主观念，以及这些世代差异效应的可持续性如何，我们可以获得新的见解。

5.结果

第一步的结果如图3所示。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不同代际间民主观念的转变（本研究中所有统计显著性的结论均来自双尾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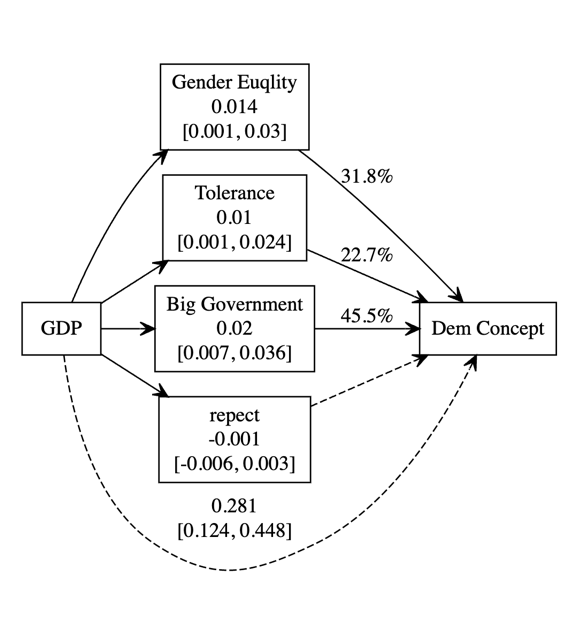
接下来，我们考察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性别平等、社会容忍度、自由竞争观念的提高以及对淡化权威的尊重。结果如表2所示，它们意味着经济发展确实带来了人们对性别平等的强调。关于社会容忍度，经济发展提高了人们对诸如同性恋等少数群体的包容和认可。经济的发展也带来公众对于自由竞争需求的增加，要求私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降低了对国有经济的依赖程度。然而，经济发展尚未影响人们对权威的尊重，这可能是由于中国民众几千年来一直深受，一直国家视为保护其臣民的家长制形象，因此导致公众愿意接受国家的主导作用价值观的影响，即使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但仍然没有改变儒家价值观对强调权威的影响，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表1: 经济发展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  | **Equality** | **Tolerance** | **Freecompetition** | **Respectauthority** |
| --- | --- | --- | --- | --- |
| GDPpercapital | 0.020\* | 0.073\*\*\* | 0.088\*\*\* | −0.037 |
|  | (0.010) | (0.016) | (0.019) | (0.025) |
| Age | 0.000 | 0.000 | 0.001\* | −0.001 |
|  | (0.000) | (0.001) | (0.001) | (0.001) |
| gender | −0.037\*\*\* | −0.010 | 0.029\*\*\* | 0.027\* |
|  | (0.004) | (0.007) | (0.008) | (0.011) |
| Education | 0.012\*\*\* | 0.055\*\*\* | 0.027\*\*\* | 0.070\*\*\* |
|  | (0.003) | (0.005) | (0.006) | (0.008) |
| PolticalInterst | −0.008\*\*\* | −0.006 | −0.037\*\*\* | −0.038\*\*\* |
|  | (0.002) | (0.004) | (0.004) | (0.006) |
| Marriage | −0.016\*\* | −0.060\*\*\* | −0.018+ | −0.010 |
|  | (0.006) | (0.009) | (0.011) | (0.014) |
| SocialTrust | −0.009+ | −0.017\* | −0.017\* | −0.041\*\*\* |
|  | (0.005) | (0.008) | (0.009) | (0.012) |
| SocialLevel | 0.001 | 0.007\*\*\* | 0.005\* | −0.008\*\* |
|  | (0.001) | (0.002) | (0.002) | (0.003) |
| Num.Obs. | 5664 | 5305 | 5308 | 5354 |
| R2 | 0.037 | 0.086 | 0.037 | 0.030 |
| R2Adj. | 0.036 | 0.084 | 0.036 | 0.029 |
| AIC | −4611.4 | 0.0 | 1608.9 | 4864.4 |
| BIC | −4545.0 | 65.7 | 1674.6 | 4930.3 |
| Log.Lik. | 2315.690 | 10.022 | −794.433 | −2422.216 |
| RMSE | 0.16 | 0.24 | 0.28 | 0.38 |
| +p<0.1，\*p<0.05，\*\*p<0.01，\*\*\*p<0.001 | | | | |

最后，本文对总效应进行检验，该结果以路线图方式进行呈现，图4中实线代表在0.05等级上的显著作用，虚线代表不显著作用，变量名下展示效应系数和95%置信区间。如上所述，为了使结果具有可比性，我们将所有中介变量放入同一个模型中，并在估计前用Gelman（2008）的方法重新调整它们。另外，考虑到每条路径对民主观念变化的影响可能并不相同。为了说明这种实质性差异，我们计算了每条路径相对于其他路径的中介效应比例。结果表明，在我们确定的四条路径中，有三条路径具有明显的影响：性别平等、社会容忍度、私有化。淡化权威对民主观念的影响并不显著。公众对市场经济中私有化程度的强调是提高程序性民主观念最重要的路径，约占45.5%。这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府借用国有企业大量干预经济以服务于统治精英和高级官僚，因此，一旦经济发展要求市场体系的变革，人们最首先要求的便是企业经营私有化以及阻止国家对资源的盘剥程度。其次，性别平等观念对于民主观念的变化起着第二重要的作用。这一机制转移了经济发展效应的31.8%，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两性平等越来越强调，这种平等观念也逐渐深入到政治领域，从而带来了程序性民主观念的提升。最后，尽管社会容忍度的增加对民主观念的影响不如前两者，但仍然占据了整个效应的22.7%，这表明经济发展确实带来了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而这也正是程序性民主的核心要素——容忍差异、允许不同所需要的。对于权威态度的不显著，可能与几千年的政治文化相关，还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后续的研究可以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审视经济发展对政治文化，尤其是对儒家价值观的长时间影响，这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这一机制。

另外，我们发现经济发展除了通过提高性别平等、促进社会容忍度和刺激自由竞争外，本身也会对民主观念的变化产生影响，这也符合



6.结论和讨论

本文旨在阐明中国公众民主观念世代差异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对代际差异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中国公众的民主观念确实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呈现出程序性民主观念。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性别平等、社会容忍度和自由竞争观念促进程序性民主观念的产生，即使并没有弱化公众对权威的遵从程度，也为当前的比较研究和民主研究提供了乐观的前景。虽然中国公众持有的民主观念与西方学界的“选举民主”大相径庭，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大众中的民主观念正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英格尔哈特），虽然扩大公众认知需要时间，并且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但并非不可能。研究表明，中国公众中的监护式民主观念为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坚实的民主基础，但可以预期只要给予民主一定的时间和耐心，中国大众会日渐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桎梏。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经济发展与民主观念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经济发展如何导致民主观念的变化尚未得到关注。本研究考察了经济发展对民主观念的作用机制，该机制通过四个特定的中介过程将二者联系起来：性别平等、社会容忍度、自由竞争和淡化权威。我们通过识别和分析将宏观经济条件与个人态度形成联系起来的机制，为现代化理论和民主观念的文献做出了贡献。本研究扩展了关于现代化对民主的政治后果的讨论，并在中国的案例中测试了这些过程。结果清楚地表明，经济发展会带来促进性别平等、提高社会容忍度、刺激自由竞争观念的产生，这三种观念进一步推动了民主观念积极面向的产生。我们希望这些发现能够补充现代化理论的文化主义解释。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民主观念的世代后果。如对中国民主程度评价的下降。

显然，中国民众对民主的支持率很高。民意调查显示，超过 90% 的中国公民认为民主是好事。但大多数人尚未准备好为民主化做出重大努力，因为他们仍然认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比言论自由、政治参与和其他民主权利更重要。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成长过程中相信政治权利和自由高于经济福祉或其他物质主义目标。15-20 年后，中国社会将被持有这种信念的人所主导。我们可以对中国民主变革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Appendix

1.APC：换世代

考虑到世代的人为划分，有人可能会质疑上述世代差异乃是由于世代划分的任意性导致的。为排除世代差异的任意因素，参照以往研究，我们按照5年一代进行划分。

2.中介效应：

2.1敏感性分析

尽管本研究希望通过中介分析揭示出经济发展对民主观念变化的因果关系，但中介分析的基本困难在于，可能存在未观察到的混杂因素对中介和结果产生因果影响。因此，为评估中介效应的有效性，我们进行了敏感性分析来检验连续可忽略性(Tingleyetal.，2014)，该检验是为了测试相关系数ρ有多大可能导致与零无异的影响。敏感性分析中系数ρ的范围为[-1，1]，非零ρ表示存在遗漏变量的风险，则可能存在违反连续可忽略性假设。表4列出了本文四条机制的临界点，它们表明除非ρ超过这些值，否则关于效应方向的原始结论将保持不变。这些敏感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即使偏离了中介变量的可忽略性，结论也是可信的。需要注意的是，现有学界对于ρ大小的确定没有明确的标准或唯一答案。例如，在今井耕介(Imaietal.，2011)发表在顶级期刊的文章中，其中报告的ρ分别为0.2和0.39；而沃尔克(Wolak，2020)发表在另一顶级期刊的文章中，报告的ρ则为0.09和0.22。然而，无论ρ值如何，目前尚未有学者声称其所报告的ρ值足够大。因此，我们表3中提出原始ρ值，供读者参考，以便了解分析结果对潜在混杂因素的敏感程度。与此同时，我们仍遵循了沃尔克(Wolak，2020)的观点，即从因果关系上解释研究结果需要非常谨慎。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来控制影响中介效应的其他因素。然而，考虑到各种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因素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也很难完全控制所有的变量，我们也希望后续研究能够继续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完善。

|  |  |
| --- | --- |
| Mediator | DemcracyConcpet |
| Genderquality | 0.1 |
| SocialTolerance | 0.05 |
| FreeCompetition | 0.1 |
| RespectAuthority | 0.05 |

2.2 中介效应表

| Mediative Effect of Econimic on Demcracy Concep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CEB** |  | **ADE** |  | **TOTAL** |
|  | 0.020 (0.000) |  | 0.279 (0.000) |  | 0.299 (0.000) |
|  | 0.014 (0.042) |  | 0.280 (0.004) |  | 0.294 (0.002) |
|  | -0.001 (0.656) |  | 0.279 (0.000) |  | 0.278 (0.000) |
|  | 0.010 (0.034) |  | 0.281 (0.000) |  | 0.291 (0.000) |
| P-value in the parentheses. | | | | | | |

2.3内生性

在正文中，我们通过中介分析验证了将经济发展—自我解放价值观—民主观念的三种路径。然而，正如许多政治文化的研究者认为，价值观的变化带来经济的发展。简单地说，学者们担心的是，正文中的实证结果并不是解释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而是相反。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以下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

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来论证上述关系。已经有很多研究证明童年所经历的经济发展状况会对成年后的价值观产生影响。比如

实证上，为了确保前者按照时间顺序对后者产生影响，我们将民主观念的滞后一年。结果如下表所示，如果经济发展不会造成民主观念的变化，那么我们不应该看到滞后的回归方程中，经济变量的显著性。